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7 期（总第 391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22 年 7 月 5 日

-
- ◆ 乡村面临的五个问题.....刘守英(1)
 - ◆ “老吴象”联系我们.....王小强(4)
 - ◆ 我愿做一株小小的菌草.....林占熺(9)
 - ◆ 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中国农网(11)
 - ◆ 中国包产到户第一人戴洁天逝世.....黄松光(15)
 - ◆ “十四五”规划的粮农建议.....靳 晋(20)
 - ◆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余淼杰(23)
 - ◆ 你梦中的田园净土——乡村人才库.....柳丝青青(25)
 - ◆ 共同富裕，须精准提高民众收入能力.....姚 洋(26)
 - ◆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历史经验研究.....郭书田(28)

乡村面临的五个问题

刘守英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

村，也不乐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

乡村振兴，怎么振兴？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

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 100 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第五个问题：坟地越来越奢华

家族跟家族之间，相互不光是比房子，还比墓群、比坟地规模。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乡村有很多陋习。

一定要强调：乡村一定要禁止占用耕地盖房、建坟墓，未来一定不能以原村落的地址做家族墓地。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出来。尽管有人会骂我，但也得提。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墓地的占用。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来源：经济观察网文章《刘守英：乡村振兴需要改革城市化模式》。

2021 年 3 月 21 日）

“老吴象”联系我们

——怀念“老吴象”去世一周年

王小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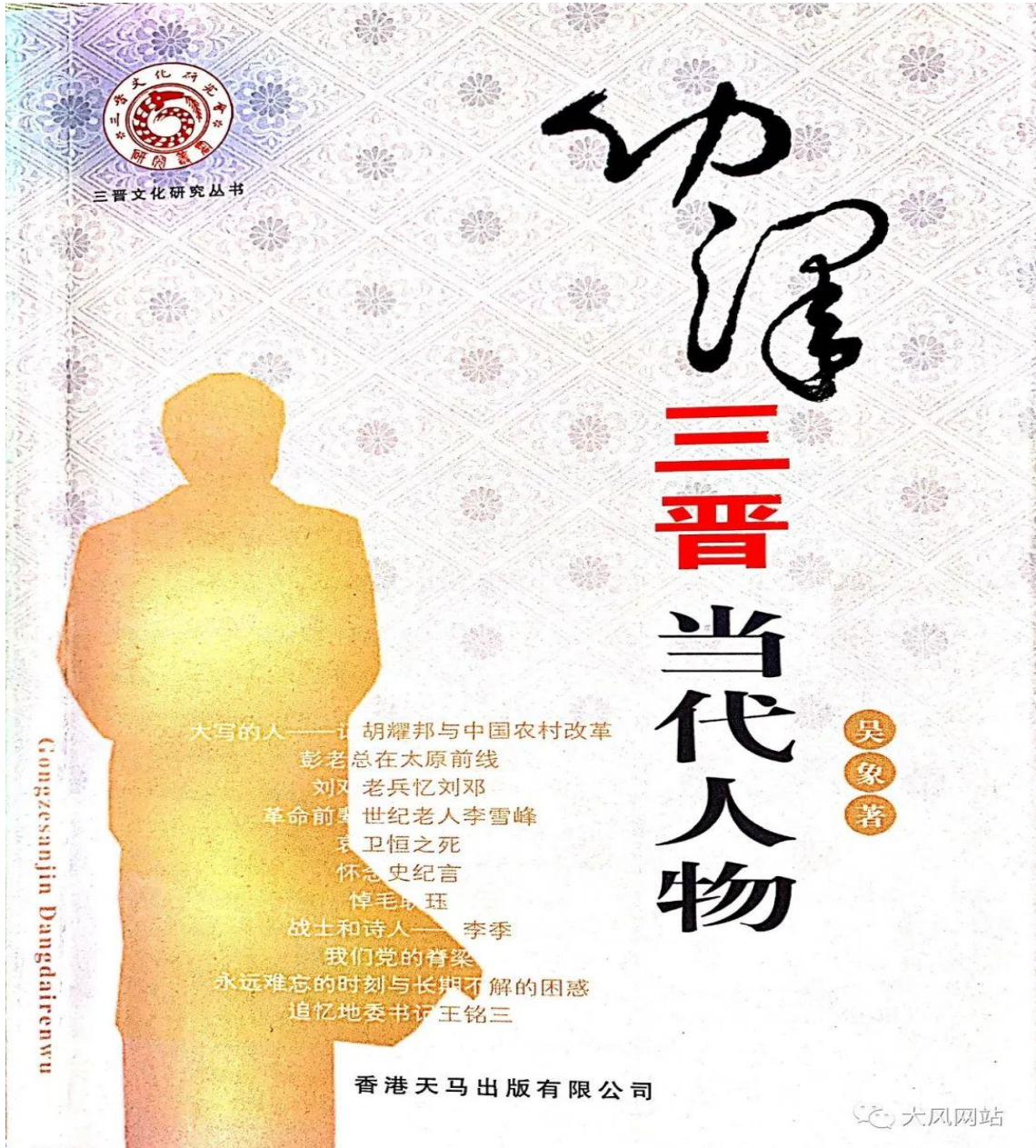
“老吴象”是发展组老同事对吴象背后的亲切称呼。

1981年暑假，发展组滁县调查一炮走红，邓力群顺势力挺，形成中央书记处文件，编制挂靠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业务由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和农村政策研究室指导。吴象是政策研究室室务委员，又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副主任，负责联系我们。那时候，发展组意气风发，多学科、高层次、综合研究，哪个业务指导？吴象代表两个研究室联系我们，没有开过一次正式会议，没有一次正式讲话，我们也没想过请他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和调研。不过，每次调研汇报、参加会议都见到他，亲切热情招呼，诚恳交换意见，慈眉善目，不温不火，一点不像写过《阳光道与独木桥》地动山摇，言谈话语，处处流露出对我们为农民奔走呼号的赞许和鼓励。记得好像从杜鹰开始，不知不觉，大家背后都叫他“老吴象”——忘年交了。2011年，他送书写我“小强同志老小友”，或许知道我们称呼他“老吴象”？

山西大同老山友批评指正

吴象 2011年7月

大风网站



陈一谘骑辆破自行车，东奔西跑四九城，春夏秋冬，唇焦舌敝，在纯粹自愿、业余、义务劳动的条件下，用理想主义，愣把一伙桀骜不驯的插队知青攒、拧成频出集体成果的研究团队，不难想象，心力交瘁，累成“疲劳综合症”，严重到必须脱离工作，邓力群安排他去苏州休养。为此，五人领导小组里，安排何维凌和我当副组长。何维凌是老大学生，文革组织学习小组打成反革命，坐牢、劳改，没有插队经历，由我主持日常工作。换言之，发展组成功不久“领导层”陷入维持状态，从1982年冬持续到1984年底，最后分头去了体改委的体改所和农研中心的农村发展所。两年时间里，我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要因为我的不知所措，把这个新鲜团体搞砸了。

雪上加霜。何维凌恃才傲物，藏否人物，指天画地，和赴美妻子通信让人捡着交有关部门了！有关部门来调查，接着，老岳母告御状。随着调查逐步深入，吴象几次找我了解何维凌，和北大老同学的关系、在发展组的作用、政治立场观点、家庭关系、感情生活。有些情况我不大清楚，知道多少说多少。一次，记不得我接电话还是打电话，中间忽然听到吴象和他人正在讨论何维凌，怎么会这么凑巧的事！后来，我参加了中组部召开安全、公安、社科院、北大的联席会议，不允许何维凌继续参与发展组。接着，何维凌“禁足”在家一年，合作邓英淘，写了两本方法论的书——《走向未来》丛书。

农村政策研究室探索农村改革突飞猛进，调查研究紧跟不上；政策研究室把握全局政治大方向，防微杜渐，1983年秋“反对精神污染”。今天回头看，堪称先知先觉：向钱看久了成对眼，明星偷税，官员贪污，钱买钱~钱生钱，流氓资产者空手套白狼，没收吴小晖上百亿财产！北大教授“吐痰改革”腐败润滑，理清产权暴发暴富，捍卫市场经济放任自流；过去不赶趟倒牛奶，如今成片拆大楼，文化体育医疗教育向钱看，食品安全~全民普及化学高科技，听说要为碰瓷儿立法了；张维迎异想天开唯有市场经济唯利是图真正构建道德伦理，连续再版的精神雾霾超级足够污染回去美帝国主义了。可是，设身处地38年前，农村刚出现几个万元户，傻子炒瓜子汗流浹背，疑难问题是脑体倒挂——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这时候，有朋友半夜鸡叫僱工剥削走邪路，很多人，我自己，不以为然。领导小组剩下邓英淘、张木生和我。邓英淘强调发展组坚持学术研究，不掺和政治。张木生强调发展组坚持改革探索，突破僱工禁区。两位兄长意见，我充分理解，完全赞成。发展组，开放式，内外不分的各种理解以及程度不同的怀疑、猜测、误会都有。

年底，吴象叫周其仁和我随他为万里起草在农村工作会议的讲话。住在文津街老干部活动中心，近一个月，我俩没事读书，打乒乓球。“老吴象”一趟一趟往对面中南海里跑，一直跑到讲话当天早晨还在改：农村不搞反对精神污染。可以说，周其仁和我对讲话稿全无贡献，记不得写过什么，不知道修改了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修改。事后想来，这也是吴象职责所在，负责联系我们。

· 调查报告 ·

农村发展中的几个新问题

——“双包到户”后的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调查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

本文是对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说明：双包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建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解决。本文着重探讨了粮食生产、土地承包、贫富差别、劳动力和资金流向、新的协作联合、农村经济职能结构和农村基层干部等几个问题。作者认为，研究这些农村发展中的新问题和新趋势，对于把握农村经济发展方向，进一步发展农村大好形势，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健康地进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调查报告的作者——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是由几十名青年理论工作者、研究生和大学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领导下组成的业余学术研究组织。本文由陈一诺、孙方明执笔。

我国广大农村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经济改革。亿万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空前提高，是这场改革取得成效的主要标志。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则是这场改革的良好起点。目前，全国农村已经建立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核算单位达到全部核算单位的97.8%，其中实行“双包到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接近50%。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已经远远超过了它本来的意义，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因而，研究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特别是双包到户以后，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趋势，对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大好形势，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意义。

为此，我们于一九八一年七、八月间，围绕“双包到户以后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趋势”这个总题目，在安徽省滁县地区进行了调查。滁县地区农村较早地实行了各种形式责任制，目前双包到户的占97%以上。该区地处江淮丘陵，自然条件中等；全区一九七七年以前按农村人口平均的农业产值、粮食产量和商品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两年则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我们重点调查了以下几个问题。

2021年5月18日，“老吴象”虚岁百年去世了。遗体告别，阿丽放的不是哀乐，是〈在太行山上〉。歌声让我想起去世多年的父亲。算年龄，吴象年长父亲两岁；论辈分儿，我该喊他“伯伯”才是啊。1976年暑假回京，我和打倒多年的父亲谈起李一哲的大字报，不甘心在洛阳农机学院学拖拉机制造。父亲告诉我：个人不过沧海一粟。他年轻时在日据北平参加了共产党，派去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隔离单间背文件，40多天不出屋，喫饭拉屎，端进送出。临走，组织上问他返回有什么个人问题，他只有一个心愿，希望继续做学生工作，得以念完中学。得，就这一句话，不及格，文件全白背了，送去抗大分校学习。父亲说，干革命不能有私心，所以共产党打败国民党。

1995年夏，我和王汉生（2015年去世）带路Peter Nolan和联合国开发总署大鼻子专家，至亲师友安排我们赴太行山了解贫困，村村都是几个老人和大群孩子，一问三不知，青壮年都去哪里打工了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春节回来，都知道小煤窑矿难频仍。大山深处，孤独一户，总算遇见一位青年，女子腿伤，斜靠在门口，院墙内外一片废墟。问起断垣残壁，回答是日本鬼子扫荡烧的！50多年过去，难以置信。临走，我掏出钱包里的钱，中外一行人沉默无语。

遥想吴象伯伯当年在太行山西部分，应当也回答过类似父亲的问答题？我理解，这正是“老吴象”和我们的联系，打断骨头连着筋。

（作者：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来源：大风网站《参阅文稿》No. 2022~6。因篇幅所限，删节大部分注释和资料来源。2022年5月18日）

我愿做一株小小的菌草

林占熺

顶着烈日，冒着酷暑，站在福建平潭幸福洋盐碱地一片茂盛的菌草旁，年近八旬的林占熺一脸幸福：“大家请看，这里是重度盐碱地，连木麻黄都无法存活，但是菌草却能稳定生长，特别是采取起垄丛栽方式种植的菌草，其长势旺盛，明显优于其他栽培方式。”“七一”前夕，这位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来到平潭长江澳的菌草基地，向几十位院士专家介绍菌草改良盐碱地和防风固沙生态成效。

长江澳是平潭最大的风口之一，风大沙猛，导致这片区域种下的植物难以成活。2018年，当地与福建农林大学合作，筛选“巨菌草”“绿洲一号”“绿洲三号”等多个适宜治理风口流沙生态的菌草品种，进行试验种植。

“经过4年的试验，我们筛选出的‘绿洲一号’菌草，可以在含盐量9%以下的盐碱地种植生长。菌草不仅能保持水土和降低土壤的盐碱度，还能作为动物饲草，具有生态和经济的双重效益。”林占熺说，在党的生日到来之际，能用新的成绩向党组织汇报，“作为一个老党员，我非常激动，也倍感幸福！”“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农民的钱袋里”，是这位被誉为世界菌草技术之父、中国扶贫“菌草鼻祖”的老党员始终坚持的科研信念。

20世纪70年代，林占熺调到福建省三明市真菌研究所工作。那时，国内外食用菌和药用菌人工栽培基本都以林木为原料，砍下树木做成菌棒培育菌类。“锯一车树回来种香菇，值不值得？”在工作中，林占熺意识到“菌林矛盾”和随之可能产生的生态问题，“以草代木”的想法从他脑海中冒了出来。此后，他克服经费不足、设备落后等困难，废寝忘食，刻苦攻关，历经几年的努力，1986年10月，菌草技术终于面世，草本植物也能用作培养基种出食用菌。随后，林占熺的菌草技术屡获各级发明展览会大奖和专利奖。

新技术蕴含着巨大商机，也意味着选择。林占熺说：“我自己是穷苦农民的孩子，深知农民的艰辛。作为党培养的农学者、共产党员，我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应该用自己的新技术去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摆脱贫困。”

于是，林占熺像菌草一样深深扎根在大地，一头扎进基层开展技术推广。一次去尤溪县推广菌草的路上，林占熺出了车祸，断了两根肋骨。他只在医院住了两天，就带伤出现在工作现场。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熺主动带着六箱菌草，到宁夏十几个县建立菌草产业扶贫示范生产基地。当地冬天滴水成冰，昼夜温差大，林占熺担心影响食用菌生长，便建了半地下室菇棚，利用废弃的窑洞栽培食用菌。他和工作队员常常住在菇棚里，夜间起来检查菇房的温度变化。

多年来，林占熺在宁夏、新疆、陕西、青海、内蒙古和西藏等地推广菌草技术，建设示范推广基地，推动菌草产业成为当地新兴产业，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如今，菌草技术已传播推广到全国31个省（区、市）的500多个县。

在林占熺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个地球仪，上面标着许多红五星。“有红五星的地方，就是我们菌草技术推广到的国家和地区，现在总共106个。”林占熺说。

菌草技术既帮助农民致富，又保护了生态，在国内取得极大成功，也吸引了世界目光。20世纪90年代末，林占熺等中国专家组成员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手把手培训当地民众学习菌草种植，让他们“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许多人翻山越岭走了几天几夜赶来学习。”林占熺回忆道。如今，菌草技术已为保护生态环境、科技扶贫与技术援外作出了重要贡献。

“只要还活着，就要做下去。”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实践“前线”的林占熺笑言自己是“80后”。他说：“作为共产党员，就要为人民奋斗一辈子。”“七一”当天，这位老党员顶着烈日，来到闽西老区龙岩永定区的农村，沿着崎岖的山路，用心调研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问题。林占熺说，经过深入调研，目前已有一定的思路，这些废弃矿山经过菌草的生态修复，不仅要完成绿化，还能形成产业链，为当地经济增长提供发展的新动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这不，他又将出席2022年福建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党的事业要继往开来，菌草事业也要一代代传下去。”林占熺说，“在青年成才的过程中，我愿做一株小小的菌草，为大家提供一点点微薄的养分。”（记者 高建进）

（作者：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来源：《光明日报》2022年07月03日03版）

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

——中央农办负责人就《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答记者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公开发布之际，中央农办负责人就《方案》制定印发和贯彻落实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方案》出台有什么背景和意义？

答：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农村，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如期完成，村庄基础设施显著改善，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往村覆盖、往户延伸还存在明显薄弱环节，与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差距。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强调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2021年、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出了具体部署。

制定出台《方案》，对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进一步提升乡村宜居宜业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是有助于推动确立乡村建设的工作导向。《方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明确了乡村建设建什么、怎么建、建成什么样，指导乡村建设行动扎实稳妥推进。二是有助于推动健全乡村建设的实施机制。《方案》将创新乡村建设推进机制作为重点，进行专章部署，旨在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乡村建设和管护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防止脱离群众想当然、拍脑袋决策，自上而下下任务、定指标。三是有助于推动乡村建设政策集成要素集聚。《方案》对加强乡村建设行动统筹协调、责任落实、政策支持、要素保障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推动打通政策痛点堵点难点，形成推进乡村建设的工作合力。

2、乡村建设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必须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求好不求快，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为重点，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逐步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一是在理念上坚持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广泛依靠农民、教育引导农民、组织带动农民搞建设，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组织保障等方面

作用，不搞大包大揽、强迫命令，不代替农民选择，严禁随意撤并村庄搞大社区、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

二是在目标上坚持从实际出发，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相协调，结合农民群众实际需要，分区分类明确目标任务，合理确定公共基础设施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不搞齐步走、“一刀切”。

三是在推进上坚持遵循城乡发展建设规律，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合理安排村庄建设时序，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财力可持续和农民可承受的基础之上，防止刮风搞运动，防止超越发展阶段搞大融资、大拆建、大开发，牢牢守住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底线。

四是在方式上坚持充分体现农村特点，保留具有本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乡村风貌，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防止机械照搬城镇建设模式。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建设，实现乡村建设与自然生态环境有机融合。健全建管用相结合的长效机制，确保乡村建设项目长期稳定发挥效用。

通过一年接着一年努力，确保到2025年乡村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往村覆盖、往户延伸取得积极进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显著加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3、乡村建设的重点是什么？

答：乡村建设的一个基本目标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水平、标准、档次可以因地制宜、高低有别，重点是保障基本功能，解决突出问题。《方案》围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12项重点任务，概括起来就是“183”行动。

“1”就是制定一个规划，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乡村规划是乡村建设的施工图，只有有了规划，乡村建设才有章法、有规矩。坚持县域规划建设一盘棋，明确村庄布局分类，合理划定各类空间管控边界，优化布局乡村生活空间。积极有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发挥村庄规划指导约束作用，确保各项建设依规有序开展。

“8”就是实施八大工程，加强农村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往村覆盖、往户延伸，稳妥有序推进八个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一是道路方面，重点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以县域为单元加快构建便捷高效的农村公路骨干网络，推动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更多向进村入户倾斜。二是供水方面，重点强化农村防汛抗旱和供水保障，加强防汛抗旱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向农村供水保障转变。三是能源方面，重点实施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工程，巩固提升农村电力保障水平，按照先立后破、农民可承受、发展可持续的要求，稳妥有序推进北方农村地区清洁取暖。四是物流方面，重点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加快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五是信息化方面，重点实施数字乡村建设

发展工程，推进数字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深度融合，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推进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六是综合服务方面，重点实施村级综合服务设施提升工程，加强村级综合服务设施建设，推进“一站式”便民服务。七是农房方面，重点实施农房质量安全提升工程，逐步建立健全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深入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传统民居保护与利用。八是农村人居环境方面，重点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统筹农村改厕和生活污水、黑臭水体治理，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3”就是健全三个体系，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推进服务和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提高农村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一是实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升行动，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形态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发挥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支撑作用，促进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在县域内统筹配置和衔接互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由注重机构行政区域覆盖向注重常住人口服务覆盖转变。二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完善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三是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推进乡村文化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广积分制、数字化等典型做法。

4、《方案》在乡村建设实施机制上有什么创新举措？

答：乡村建设涉及领域广、部门多，《方案》从责任落实、项目管理、农民参与、运行管护等方面提出乡村建设实施机制，确保乡村建设行动落地见效。

一是创新责任落实机制。建立条块结合的专项任务责任制，按照一项任务、一个推进方案的要求，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制定专项推进方案，各地细化措施抓好落实，强化政策衔接协调，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创新项目管理机制。建立项目库管理制度，在县一级普遍建立乡村建设相关项目库，优先纳入、优先安排群众需求强烈、短板突出、兼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改善的项目，结合实际制定“负面清单”，防止形象工程。优化项目实施流程，小型村庄建设项目可按规定施行简易审批，农民投资投劳项目可以采取直接补助、以奖代补等方式推进建设。

三是创新农民参与机制。农民是乡村生产生活的主体，搞乡村建设关键是要把农民组织动员起来，下决心建立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农民参与的实施机制。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用，引导农民全程参与乡村建设，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四是创新运行管护机制。以清单形式明确村庄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主体、管护责任、管护方式、管护经费来源等，建立公示制度。推行“门前三包”、受益农民认领、组建使用者协会等农民自管方式，引导农民参与管护。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城乡一体化管护。

5、《方案》在乡村建设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方面提出了哪些措施？

答：围绕强化乡村建设“人、地、钱”要素保障，《方案》提出了一揽子政策支持措施。

一是投入保障。从财政投入、金融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健全乡村建设多元化投入机制。明确中央财政、中央预算内投资、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债券等支持乡村建设具体要求，创新金融服务拓宽乡村建设融资渠道，大力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投入乡村建设。

二是用地保障。合理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规范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保障乡村建设行动重点工程项目的合理用地需求。优化用地审批流程，探索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腾挪空间用于支持乡村建设。

三是人才保障。加快培育各类技术技能和服务管理人员，探索建立乡村工匠培养和管理制度，支持熟悉乡村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村庄规划设计和项目建设，建立健全乡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等标准体系。

6、对贯彻落实《方案》有哪些具体部署？

答：《方案》明确了乡村建设行动的任务书、路线图，下一步关键是抓好贯彻落实，重点做好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抓统筹协调。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要求，中央层面建立专项推进机制，省级党委和政府精心组织、加强协调，市县乡党委和政府细化具体措施，确保各项建设任务落到实处。

二是抓清单管理。按照近细远粗、分步建设的原则，省级确定年度建设任务并细化到县级。县级按照建设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要求，科学制定任务清单，建立乡村建设台账。

三是抓评估考核。将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情况作为乡村振兴督查考核的重要内容，实施乡村建设评价，采取第三方评估、交叉考核、群众满意度调查等方式，确保乡村建设项目质量和实际效果。

四是抓示范引导。结合“百县千乡万村”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统筹开展乡村建设示范创建，及时总结推广乡村建设好经验好做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来源：中国农网，2022年5月23日）

中国“包产到户”第一人戴洁天逝世

黄松光

100岁，对一个人来讲已然是生命的奇迹，而他的这100年还充满着曲折与传奇。

6月20日，细雨连绵。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传出一个消息：中国包产到户第一人，离世了。

他是戴洁天，温州市一位特别的退休干部。66年前，他曾率领燎原社近千农户首创了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比安徽小岗村实施“包产到户”早了22年。

2022年，虚岁100岁的戴老，在开心过完这一年的父亲节后，溘然离世，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



少年时期的革命之路

1923年，戴洁天出生在温州瑞安白门乡下川村（今温州瓯海区丽岙街道）的没落地主家庭。6岁丧母，11岁移居温州城区在瓯江小学读书，13岁考入联中（今温二中），受进步学生、补课老师政治启蒙，先后参加进步学生读书会、抗日学生联合会、战时青年服务团等进步组织。

1947年，他考入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又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

1948年秋，他回到温州参加由瑞安县委领导的隐藏在温州城区的一个地下组织，并接受做好迎接浙南游击纵队解放温州和迎接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准备工作，后成为永嘉青年工作队队员。

瑞安解放后，他返回瑞安，被分配到第一期小学校长训练班工作，后到省立温师温州小学部担任政治课教师兼生活指导主任。

1950年，他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由团市委输送浙江干校第四期土改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温州地区参加土改，经地委分配到永嘉县土改工作队。

首创“包产到户”点燃燎原之火

解放后，迎来的是大生产和大建设，每一个中国劳动者都饱含着热情投身生产建设当中。

1955年，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在中国各地的农村兴起。这一年，33岁的戴洁天作为温州永嘉县委农工部青年干部，被县委任命为工作队队长，到当地的潘桥集体农庄帮助实现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工作。

在集体农庄做了一段时间的调研后，他发现合作社并没有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还存在商品不流通，市场缺位等问题。

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充分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呢？戴洁天做了许多思考，还专门买来了苏联集体农庄生产管理的相关书籍作参考。

在书中，他惊讶的发现，即便是被称为“老大哥”的苏联，关于集体农庄也有着与传统认知截然不同的看法。

“把土地拨归社员个人负责，不但不削弱队或小组的力量，反而使他巩固了”。他将《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一书中写出的这句内容记在了笔记上。

他认为，这句话所含的意义，就是破解劳动积极性问题的关键。

1956年5月，当时归属温州永嘉县三溪区雄溪乡的凰桥、任桥、曹埭三个村（今属瓯海区郭溪街道）近千农户，联合办起一个农业高级社“燎原社”。

作为读过新闻专业的知识分子和机关青年干部，戴洁天走进燎原社的田间地头，与农户同吃同住，一起劳动。在频繁的实地接触中，他发觉农村的生产关系过于脱离实际，这使得农民的生产热情受到挫伤，从而出现“出工不出力”的情况。查阅政策文件以及外地的新尝试后，戴洁天心里逐渐形成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形成“包产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责任制，称为“包产到户”，用这个方法把收益与农户的劳动积极性直接挂钩。

想法涌现，他立即写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被上报给了永嘉县委。

同样来自农村的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分管农业的县委宣传部长（后提任为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阅读报告之后拍案而起，原来在他俩心中也早就有了相似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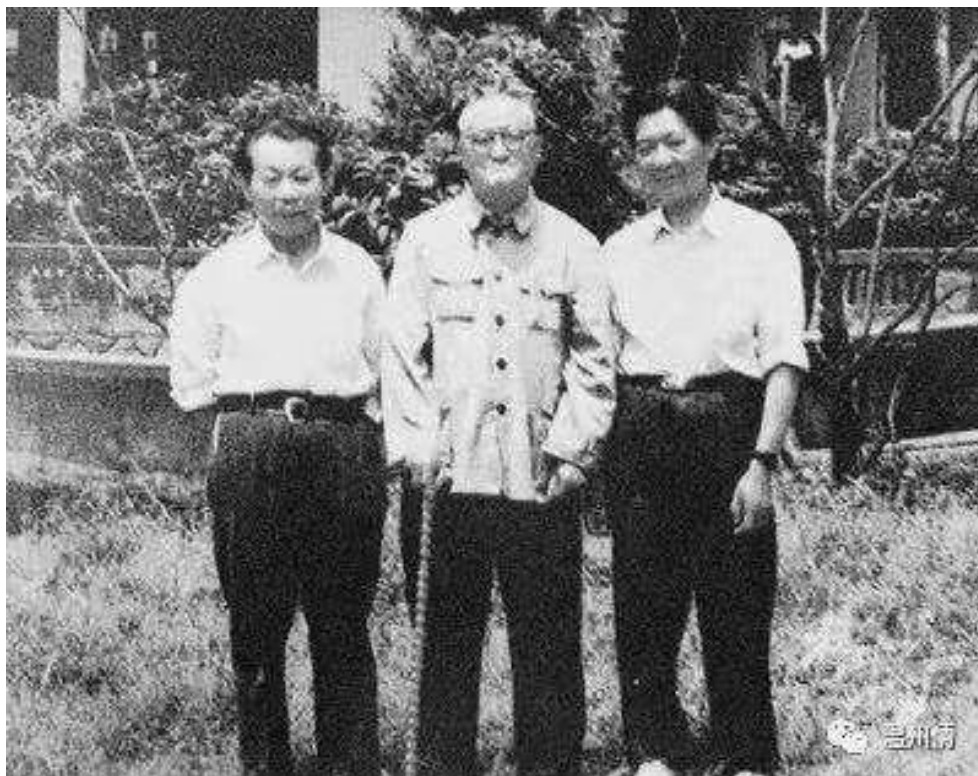
这一年的5月21日，包产到户的办法在永嘉县委常委会上通过，开始在三溪区雄溪乡燎原农业生

产合作社（简称“燎原社”）试点实施。

他们将 5482 亩水田和 130 亩园地的田间作业、工种工分和计划发包的产量，全部落实到 788 个有劳动底分的劳动者身上，做到土地丘丘有主、产量人人有责。

这一招很快取得了成效，农民们的劳动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每个人都干劲十足。1957 年 4 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燎原社迎来第一个丰收季节，燎原社 85% 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单季春粮竟然增产 40%。

燎原社“试点”的经验和成果使得“燎原经验”这个星星之火真正形成了燎原之势。到 1957 年，温州地区 1000 多个合作社推行了“包产到户”。



（戴洁天和李桂茂、李云河合影）

书写整理资料 1000 余公斤，被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赞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

在燎原试点的十个月里，戴洁天白天下田劳动，夜间开会研究，逐项设计各类农活的岗位职责、要求并测算数据，组织社员讨论修改，再到实践中验证。

后来，有人从燎原社的老屋里找到几只大木箱，里面装满当年试点留下的资料，有设计方案、谈话记录、测算数据、总结材料，还有他参与编印的油印小报《我爱燎原》等，总共 1000 余公斤！

白纸黑字、一笔一划写出来的这些材料，都是试点干部的心血结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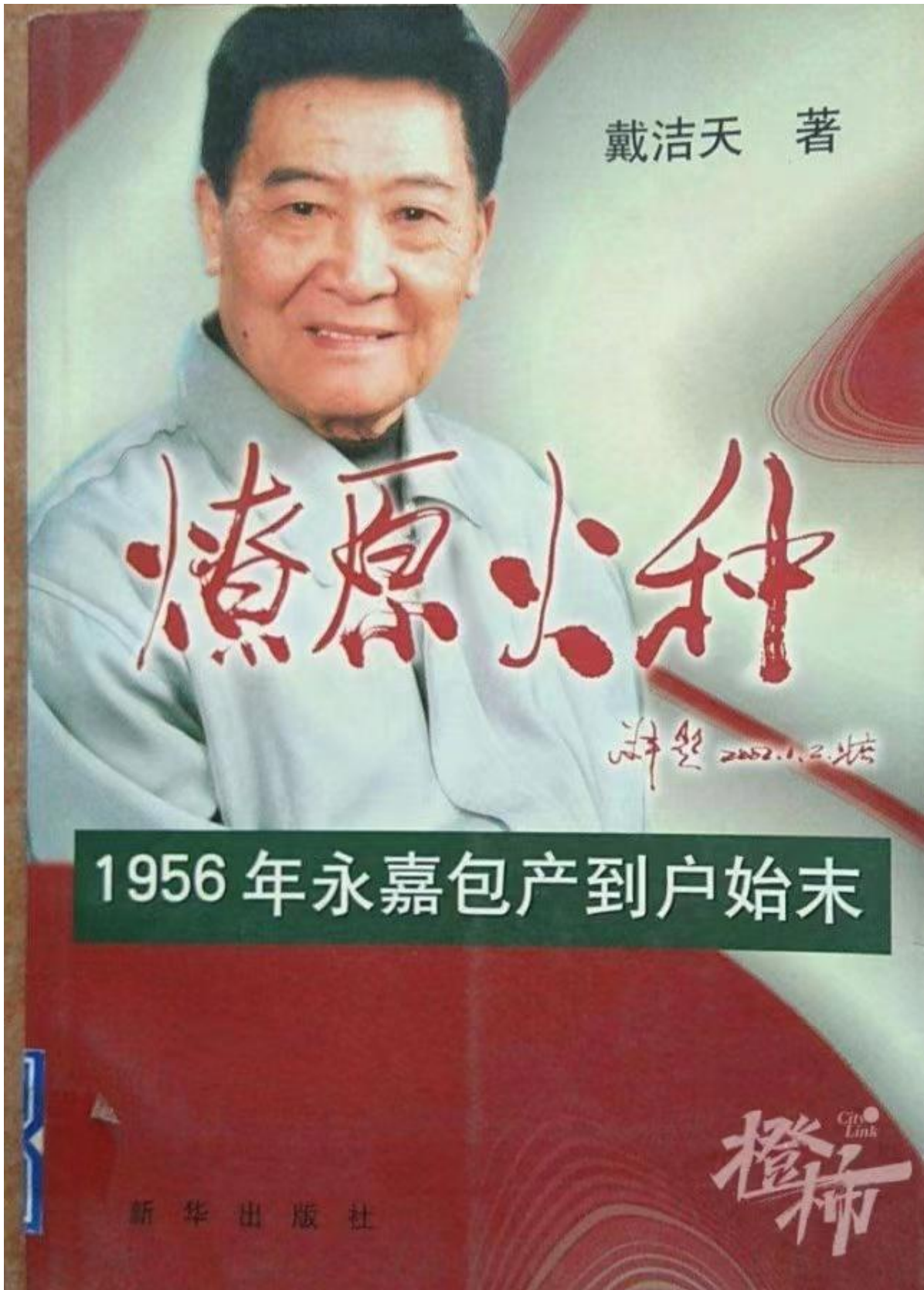
温州的实践结果给了戴洁天关于农村改革的最大支持。

他在当时写给浙江省委的报告中，用坚定的笔触写下结论：“生产责任制是可以深入到每个社员身上，能够发挥广大社员的创造性，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此后，他还写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史上第一份在集体经济中建立联产责任制即实行包产到户的系

统总结的《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

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话说，这次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开了农村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先例，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



春风又绿江南岸，“包产到户”最终席卷中华大地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这是在温州永嘉燎原社试点“包产到户”22年之后，“包产到户”的做法再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农村，并且在这一年的秋天为小岗村带来了丰富的收获。它证明了戴洁天22年前的行动是正确的。

1979年，随着一纸平反书的到来，戴洁天结束了戴罪的生活，恢复了职务。关于从前针对他的那些实时报道，他却不争不辩。

复职后的戴洁天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调进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新的岗位，给了他观察和思考新空间，他看到“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仅在农业领域，事实上它释放出的是市场经济的种子，于是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开始孕育。他的研究从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到了对经济领域里“温州模式”的研究。

而此时，他倾注心血和希望的“包产到户”星星之火，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里形成燎原之势，席卷了神州大地。

1981，《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首次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农业战线上这场延续25年之久的大辩论方告一段落。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燎原社因首创“包产到户”而闻名全国。

2003年3月，戴洁天用心用情撰写的《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由新华出版社出版。2011年，“包产到户”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2014年3月，《中国燎原社》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浙江省百项档案编研精品。

1998年7月27日，正值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杜润生第四次来温州，参加了纪念包产到户改革42周年的座谈会。那天，他戴洁天等与会者说：“今天，历史出了头了，他出来作证。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我们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知悉正在筹建燎原社纪念馆，杜润生亲笔题写了“燎原社史陈列馆”和“包产到户第一县”大字。“1956年的那场实验是永嘉县的光荣，是温州地区的光荣，也是浙江的光荣，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人民办好事。”2005年5月2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接见并听取戴洁天40余分钟关于“包产到户”实践过程汇报后这样夸赞。

这位令人敬仰、爱戴的百岁老人虽离我们而去，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作者：原瓯海区委报道组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瓯海区新闻中心主任。来源：都市快报。2022年6月22日）

“十四五”规划的粮农建议

靳 晋

正如古圣贤谋求千秋万代之福，中国共产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制定了十三个“五年计划”。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提出两个“奋斗十五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考，十四五规划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规划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方略为指导思想。民以食为天，由于近期疫情及洪涝灾害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加之农业生产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导致生态破坏、土壤板结、污染严重，必然致使人民健康受到威胁，非传染性重大疾病占到医保开支的80%。

因此，康复生态，治理污染是头等大事，需要将整个农业提升为功效营养源农业，在食品领域实现“深加工治未病”的思路。我们提出“农医一体化”的理念，从源头上以农业为抓手，食品干净了，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得以实现。

一、建议调整宏观营养源结构，重点解决畜牧业过度耗粮耗水。

1、缩减畜牧业：畜牧业耗粮60%以上，耗水80%以上，为国内第一耗粮耗水产业。

(1) 可用生物菌丝体仿生肉技术生产菌丝蛋白，再加上植物蛋白，生产仿生鸡、鸭、鱼肉和海鲜，全面替代畜牧业和海鲜肉食产品。

(2) 畜牧业饲料可用营养酸模（亩产15-20吨）、巨菌草（亩产20-30吨）等高产且富含植物蛋白的饲草代替。

2、药食同源治未病。

(1) 生产抗非传染性重大疾病的仿生肉，包括：抗心脑血管病仿生肉、抗肿瘤仿生肉，抗四高仿生肉，在大众饮食中防治未病。

(2) 生产功效粮食：大量种植薯类作物、魔芋等，添加有关植物营养成分，生产薯类、魔芋等功效粮食，令其具有防治非传染病重大疾病功效，可作为“第四主粮”，而且可以工厂化生产。

由此可见大力发展“农业仿生产业”，可大大节约粮食、节水、节省土地等大量农业资源；此类仿生肉食品既无激素又无抗生素，可减少40%的非传染性重大疾病，又可康复生态，还可防止疫情再度爆发，益处诸多！

二、建议拓荒治沙。

我国有14.8亿亩盐碱地，大力种植海稻、营养酸模、乔木灌木等耐盐碱作物，单种植海稻一项即

可解决我国人民吃饭问题。营养酸模耐盐碱，亩产 15-20 吨，即可作为蔬菜，又可作为畜禽高蛋白饲草（已被农业农村部命名“鲁梅克司 K-1 号”），还可提取 SOD 及多种中药成分，极具保健价值。

我国有 260 万平方公里沙漠，十四五规划要大力发展“沙产业”，用引水、纳米集露取水及相关治沙技术，种植油莎豆、沙蒿、沙棘、巨菌草、营养酸模等耐干旱沙漠经济作物。运用生物技术、提取技术，就地加工，生产具有保健和治疗功效的粮油、中药保健品等，更可产生高经济附加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营养酸模的价值，尤在提取 SOD（超氧化物歧化酶）。

有关治沙人力资源问题，可以考虑一是 60 万退转军人，只要国家出台激励措施和补贴方式，可安置引导。二是服刑人员，包括贪官、刑事、经济等罪犯，将功补过。不乏人力支援。

三、建议大力植树造林，即拓展生态又补充粮源。

植树造林可增加“碳汇”，又可补充粮源。十四五期间全国森林覆盖面积超过 40%。其中经济林木可同粮食作物进行农林间作。把退耕还林、退牧还林、荒地造林落到实处。

1、造林产多糖。

种植食用又有药用价值的林木作物，如杜仲、桑榆等。运用酸解技术，以树叶等为原料生产叶绿素多糖，加以面粉，可补充粮食总量的 10%以上。多糖是低热量产品，可以降脂，又具营养保健功效，可成为粮食营养源的亮点。

2、发展林下经济作物：林下真菌、蔬菜、昆虫、药材、其他种植，经过深加工，生产粮食及其他产品。

3、发展食用菌：利用巨菌草等低成本原材料生产食用菌，同时充分利用地下防空洞、废弃煤矿等空间。食用菌对抗肿瘤有重要保健作用，也是仿生肉食的重要材料，应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要营养源。

四、营养源疫情防控建议。

我国经历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洗礼，应充分考虑疫情防控措施，建议如下：

1、仿生肉代替杀生：前文提出大力发展农业仿生学，以生物合成技术制成“仿生肉食及海鲜”，杜绝打捞和进口生鲜，切断新型冠状病毒国内外风险。

2、止杀消弭疠气：大医家吴又可可在《瘟疫论》中提出瘟疫疠气致病因素，瘟疫乃是天地之间别有一种疠气为因产生，这种疠气是因屠宰畜禽而致。美国一家大型屠宰场，即有上千人集体感染新冠病毒。我国历次疫情爆发也是海鲜市场发端，今年起自武汉、北京新发地、大连海鲜市场。不屠宰畜禽是消弭疠气的根本途径。因而，新十四五规划中建议缩减乃至停止屠宰，降低畜禽业。

3、提高全民集体素质是为根本，这就要全面康复生态、治理污染、修复土壤。建议国家出台政策法规，全面禁止使用化学农药、化肥、生长激素、除草剂等；同时全面禁止食用转基因食品，这一举措应为十四五规划之重中之重，并大力落实。

4、治未病与治未疫情相结合：在食品的种植与深加工方面，除了种植以及生产防治非传染性重大疾病的粮食和产品以外，还要种植和加工防治疫情的农作物和产品。根据今年疫情的发展，从中医辨证

论治的角度来看，属太阴与少阳合症，感染患者主要涉及肝、肺、胃三个器官，因此营养源要考虑润肺疏肝、健脾胃的保健功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从体质上分：有痰湿易感、气虚易感、湿热易感、阴虚易感四种类型，因此在种植和深加工时，应充分考虑到四种偏颇体质的改善。

5、引药入食：大量种植艾叶、苏叶、陈皮、甘草等具有防疫功效的可食用的中药材，同时在种植过程中，将这些药材的浸泡汁液喷洒于相关农作物，亦可大大提高农作物的防疫功效，同时可以驱虫。

6 引药入饮：大量种植营养酸模、苏叶、艾叶及其他中药材，制成多种饮料配方用于防疫。

7、特别建议大力推进营养酸模的种植，这是一篇大文章，不赘述。

五、用种植技术康复生态、提升产量的品质。

1、量子水处理技术的水用于灌溉，可实现增产 10-15%，并大大减少病虫害，又有助于恢复土壤板结。

2、综合利用生物复合菌肥、炭基肥、腐植酸肥等，不仅增产，有效治理生态污染和土壤板结。

3、中药驱虫剂可使农作物实现纯有机种植，并增加农作物的品质和营养。

4、用中药和生物制剂合成的植物生长剂，可明显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5、运用量子种植技术发展无土栽培。

6、推广空中蔬菜花园种植技术，节约土地面积，避免土地污染。

7、将整个农业提升为营养源产业。

六、整体提升农业境界和大众保健意识，提高“治未病”“治未疫”的功效。

1、按中医八纲辨证角度，现代人多湿症，肾为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在农业种植和营养源加工生产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健脾益肾、脾胃寒湿、肾气不足等问题，要考虑培补根本。

2、种植品质的提升可应用 SOD 喷施技术，使农作物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歧化人体自由基，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和疾病的抵抗力。同样，将中药有效成分喷射到农作物器官表面，使农作物富含中药有效成分，实现防病防疫功效。

3、运用生物技术和提取技术，将 SOD 和花青素等直接溶入到粮食中，实现抗癌抗疫功效。

4、利用电磁裂解技术可将植物蛋白加工成活性肽，用以增强人体免疫力。

5、利用符合技术加工薯类大米，防治疾病。

七、全国统一颁发农业种植、管理技能、创新产业等国家证书，对持证者在粮食、种植、技术、资金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植。

八、严惩敌对势力利诱的精英集团、卖国分子在我国打粮食战、病毒战时戕害我国的民族败类！

(作者:靳晋,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前主席,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常委。来源:中国乡村杂志 2021 年第 3 期)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余淼杰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8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强调，我们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今天请允许我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此次会议精神的学习体会。

先分享第一点，为什么要促进共同富裕。

促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是我们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体现。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我们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绿色、协调、共享、开放的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是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促进共同富裕，跟新发展理念里面的协调跟共享紧密相关。协调包括三个方面的协调，城乡方面的协调，我们要保证城乡收入差距不要太大，城乡收入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区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它要协调共进。各个行业它的收入差距不要太大。当我们讲到协调的时候，跟共同富裕是紧密相关的。

新发展理念的第四点是共享。我们今年已经实现了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下一步我们要转向乡村振兴，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第二点，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跟艰巨性。

回顾70多年的发展史，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从1949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我们建立起一个门类齐全、种类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城乡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人民的幸福度在不断提高。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标是解放跟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在这个阶段中，一个客观的必然的结果就是城乡的收入差距，或者行业的相对收入以及区域的收入差距在逐步的扩大。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经济蛋糕越做越大，我们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大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过去将近10年的时间中，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在下降。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差不多是3.5倍，现在是下降到2.5。行业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东部发达地区跟西部欠发达地区，差距也逐步的在缩小。

反映我国收入分配情况的基尼系数也不断在下降。

如果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它的基尼系数下降的话，代表着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地区它的经济越趋于平均，或者说财富的分配程度更加平等。我国在2020年的基尼系数只有0.41(41%)考虑到我们是

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话，那么这一个基尼系数在国际范围内来讲是比较低的。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体现了我们一直在向共同富裕的路上迈进。

第三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促进共同富裕？

我们要正确认识好效率跟公平的关系。当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的时候，我们要强调两条腿走路，强调两手都要抓，公平和效率都重要，一个也不能少。强调效率、强调公平，就是要强调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它不是单一的、绝对的平均主义，相反，它是分阶段、分步骤来实施。

我们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系统工程。什么是初次分配呢？其实就是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换言之，我们实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个目标就是要强调效率，强调把蛋糕做大，这是初步的分配。

然而，光有初步的分配是不够的，我们也要强调再次的分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再次分配呢？其实就是发挥政府的力量，强调再次调节，主要是通过我们平时所采用的一些财政政策，包括税收，包括公共支出，包括转移支付这样的财政工具来实施。当然有时候也辅之以货币政策来实施。

我们要发挥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们先进的地区要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的东部沿海地区要帮助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实施我们的国家战略，振兴东北，援助西北，扶持革命老区这样的机制，来帮我们实现再分配的目标。

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也明确提出，我们还要进行第三次分配，它的核心和要义其实强调的是道德的力量。

如果说初次分配讲的是市场的力量，再分配讲的是政府的力量，那第三次分配它讲的是道德的力量。

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倡导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鼓励先进的人们来帮助落后的人们。我们要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来帮助后富起来的人，实现共同富裕。

具体来说，应该如何落地实施第三次分配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第一是从税收方面的改革，第二是慈善捐献方面的改革。我们强调共同富裕，目标就是要实现勤劳致富，实现创新致富，不是坐以待成这样的一种形态。

我们可以考虑通过税种鼓励老百姓勤劳致富，而不是通过代际的转移，让自己变得更加富有，这样的话也有利于我们实现共同富裕。

在某个成熟的程度上，可以考虑征收房产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第三次分配强调捐献和慈善。一是进行捐献前的免税，二是鼓励更多的人进行捐赠，三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使一部分收入比较高的人群，愿意进行捐赠。

总之，在十四五规划，乃至到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促进共同富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作者：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1年9月9日余森杰应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新闻传播中心邀请而录制的公开课）

你梦中的田园净土——乡村人才库

柳丝青青

鲁迅说：“土壤就像黄金一样，你肯去开拓，总会有收获的。”我说：“乡村人才库就像你梦中的田园净土一样，你肯去寻觅，总会有收获的。”近期，乡村人才库软件升级，以纯天然绿色乡村文化的格调推送文图视频，以及乡村人才认证，为乡村人才提供电子版著作在线制作，优秀作品付费阅读等增收功能。

乡村人才库升级后，以多种载体向全国人民展示我国乡村的繁荣发展与各地不同的地域文化、民俗文化、乡风文明、新乡村风貌、村史、农耕文化等，从多角度呈现古今乡村的面貌与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以及人们一路走来的沧桑岁月和那一抹淳朴的静好时光，可谓是当今社会的一股清流，一片清新的田园净土呈现于世。

我说乡村就是村头一条泥泞的小路，从这边通往那边，满载着人间烟火生生不息；我说乡村就是一卷历史长廊，刻满了回不去的小桥流水飞鸟鸣翠……

乡村是人们的物质和灵魂的家园，乡村文化是人们的精神食粮与心灵的寓所。人们在劳动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生活信仰、生活习俗、民约乡规等文化形态，也是人们在生活中为人处世的原则性与对社会的认知等。所以，乡村文化是振兴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复兴，文化先行。

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兴盛，就在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存在与兴起。中乡美多年来一直秉承纯天然的绿色乡村文化建设，沿着这条不变的道路扎根乡村，积累经验，为乡村人才搭建创作空间，提升人才自身价值，呼吁社会更多人关注乡村、关注乡村生活、关注乡村人才，弘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接续相传，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走向富裕！

2021年，中乡美竭力打造纯天然的绿色乡村文化创作平台，在乡村人才库原有的定性上增加不同的服务功能，为创作者提供文图视频发稿多种参赛活动，也将开启“乡村人才库书”出版印刷市场交流活动，以及为创作者提供免费在线编辑制作电子版书籍，人才热榜等服务功能，并增加终身会员制享终身权益功能，永久保存会员资料、永久保存会员创作的作品，永久保存人才查询功能，所有认证的人才都可以在乡村人才库随时查询人才个人资料及作品。提高乡村人才的知名度，为乡村人才创造更高的价值，塑造人才个人品牌、个人形象标签。此举措，是中乡美建设纯天然绿色乡村文化、发展乡村人才的新起点、新创意，也将引导更多人踏上一个新征程。

乡村人才库相约天下人才，共享乡村人才魅力！临摹乡村未来，人人创作人人有价值，为了那些创造价值的追梦人，中乡美送你一片梦中的田园净土——乡村人才库，让我们共同开垦，描绘诗与画的生活……

（作者：徐秀，《中国乡村》社长。来源：中国乡村2021年第3期）

共同富裕，须精准提高民众收入能力

姚 洋

“共同富裕”是当前的热词。何谓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路该如何走？社会上有不少讨论。

平均主义不是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吃过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亏。在“大锅饭”体制下，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经济体系低效。我们不能再重复这样的错误。

当前，一小部分人不仅财富来路可疑，而且高调炫耀，引起社会的反感。但是，“杀富济贫”不是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承担企业失败的风险，社会舆论容易被“幸存者偏差”所左右，只看到成功的企业家，而容易忘记那些失败的企业家。实际上，成功企业家的高收入是以更多失败企业家的损失为基础，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层面上，让潜在的企业家打平他们的期望收益和投资成本。

笔者认为，共同富裕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托底”，另一个是“提升”。“托底”就是为所有人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让民众摆脱对衰老、失业、疾病和匮乏的恐惧；“提升”就是提升民众的收入能力，让所有人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更多的收入。社会保障不仅是社会福利，也可以促进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它降低了掉入贫困陷阱的风险，民众就可以放开手脚，去从事有一定风险、但回报率更高的生产活动，比如开个小店、发明一项新技术，或者开办企业等等。提升民众收入能力是“授人以渔”，让低收入群体依靠自身获得更高的收入，缩小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换言之，共同富裕不是要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拉下来，而是要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上去。

这样的目标，与中国人的道德观是一致的。我国古代社会就有社会保障机制。南方地区长期存在各种族田，为本族成员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宋代开始有政府承办的福利制度，救助老弱病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理想。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公平观是建立在古老的比例原则之上的。这个原则是轴心时代先哲们所秉持的公平原则，孔子、孟子、墨子以及亚里士多德都相信，一个人得到的回报应该与他的能力和努力成正比。儒家和墨家更是提出了政治贤能主张，认为选贤任能是分配政治职位的原则。这些原则仍然被今天的中国人所认可，并在实践中得到实施。

近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

排。

一次分配的原则是按要素分配。计划经济时代强调按劳分配但没有严格执行，而是以“大锅饭”为主。改革开放成功的奥秘之一就是放弃“大锅饭”，实行按要素分配，劳动、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按照它们的边际贡献获得报酬。从理论上讲，按要素分配是按劳分配的一种宽泛的形式，因为劳动力之外的各种要素说到底都是劳动积累的产物。按要素分配不仅可以提高各种要素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可以让市场形成合理的要素价格，指导资源的流向和配置，提高经济体系的效率。

二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体。按要素分配要尊重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同时也难免受到能力和努力之外因素的影响，必然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就需要政府通过税收和再分配对收入和财富进行二次调节。但调节不是简单的“削峰填谷”，把从企业和高收入者那里收到的税收分给低收入者就了事，而是精准地提高民众的收入能力，这样才能获得持续的共同富裕。

在今天的中国，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提升收入能力的关键，一夜暴富的草莽英雄时代已经结束。

但中国的教育水平分布不均，大城市的高等教育已经趋于普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平均教育水平才刚过初中。教育的阶层固化也日趋严重，子女教育水平与父母教育水平的相关性已经回到了上世纪 30 年代的水平。家庭的教育投入出现分化：中等收入群体对子女的教育日益重视，“鸡娃”和焦虑成为常态；低收入家庭出现躺平、放弃孩子课外辅导的状况。

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笔者认为，实行小学和中学各五年的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小学生的无效竞争，也有利于政府教育投入的均等化。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的待遇，吸引优秀教师长期扎根农村学校，也是实现教育均等化的有效措施之一。

三次分配是厉以宁先生 30 多年前提出来的概念，自愿是它的原则。在这方面，一些企业家做出了表率，他们积极投入我国的慈善事业，是慈善捐款的主体力量。但是，就促进共同富裕而言，三次分配只能是锦上添花，因为其数量毕竟是有限，它更多的是体现社会的互帮互助精神，而不是强制性的再分配。最适合三次分配发挥作用的地方，是救助社会保障无法触及的贫困领域、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的资助以及引领社会的文化艺术事业。

（作者：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来源：北大国发院简报。2021 年 8 月 30 日）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历史经验研究

郭书田

【前言】：

结构问题存在于万物之中，也就是存在于自然界与社会界各个领域。研究结构问题的方法，称之为“结构学”，从语言结构到文化社会结构，称之为“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代表人物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 1857-1913），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倡导的。近些年来，研究经济社会结构的日益增多，这是因为全球经济社会结构出现的诸多失衡问题甚为突出，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虽有不同，而又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重要特征，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处于历史最为黑暗的时代，自从有了共产党，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建立以后的 70 多年中，特别是改革开放的 40 多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基本上照搬了苏联整套做法，是不成功的，出现了经济社会失衡的重大缺陷。1985 年，我与南开大学教授刘纯彬合著了一本《失衡的中国》，从 14 个方面记述了失衡的表现，虽有争议，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同。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以农村为突破口，在改变历史上形成的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中，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应该看到，这种二元结构根深蒂固，积重难返，有些深层次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在党的 20 大即将召开之际，把多年来对这个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重点放在社会结构方面，提出解决的办法，供决策研究参考。

研究与解决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要端正中国农民的历史地位与现状的认识。

1、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历史悠久，创造与传承中华农耕文明对世界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主体是农民，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改朝换代的主要力量是农民。

2、自从有了共产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革命战争中，农村是重要载体，农民是主力，作出重大牺牲的是农民。

3、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实行工业化建设，是在苏联援助并由他们派专家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所需资金照搬了他们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由农民勒紧“裤腰带”，提供了“原始积累”，为形成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农民，偿还苏联援助 156 个工业项目的贷款与利息，是由农民出口茶叶换成外汇解决的，在抗美援朝中购买苏联军备的贷款与利息，用出口农产品偿还成为无外债国家的是农民。

4、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实行“一化三改”（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受损伤最大的是农民。在“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目标的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把以土地入股分红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认为是“半社会主义”，把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无偿变为集体所有，就是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成为社会主义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推行了“一大二公”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持续了 20 年之久，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出现的“五风”（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平调资产），吃尽苦头的是农民，包括 1959-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事件。这是一次全局性重大失误，造成经济社会极大

困难。

5、在“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文化大革命”中，农民为了生存，在十分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仍坚持生产，特别是使粮食产量年年有所增加。为保证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维护社会安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农民。全国乱了，而农村没有乱，这是在第二次全局性失误中为减少损失作出的特殊贡献的是农民。

6、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一大批党政级干部（包括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下放到农村建立起来的“五七干校”，有以北京农业大学为首的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的师生员工下放农村，农村成为接受这些人群的载体，而排除困难承担这项任务的主人是农民。

7、中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农村是突破口，农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顶着受批判的意识形态压力，大胆而又勇敢的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如土地的“包干到户”，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民主政治建设的村民自治等，取得了显著成效，带动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每项成就都充满了对传统思想观念的“叛逆”，充分说明中国有智慧与创造力的人群是农民。

8、在200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与2020年全球冠状病毒肆虐中，两次都有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由于有几亩承包地，为承担保持社会稳定的任务作出重大贡献受到国际社会好评的是农民。

9、改革开放是无止境的，是不会停滞的。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消灭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为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人们自然会问，中国农民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十分明显，为何现在仍是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弱势群体，这正是要害，这就需从深层次的问题说起，有两个重要因素困惑自己，一是意识形态障碍，“姓社”与“姓资”问题并未根除，这个障碍在很大程度上仍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也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理解，不能以马克思主义为名行实用主义之实。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既得利益者（部门利益、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利益），当官的也就是掌权的，权不是为民所用，而是为己所谋，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难以根本解决，根子就在这里。

为能正确对待农民，还需要矫正对农民认识上的误区，而这些误区影响甚大，流传甚广，直到如今，尚未完全扭转。一是认为农民是小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二是认为农民是站在十字路口的阶级，会产生资本主义，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三是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单干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四是认为社会主义就要动摇和消灭私有制，在集体经济组织中把资产所有权量化到农民身上就是私有化，是对集体经济的瓦解等。这些说法实际上已成为对农民实行错误政策的理论依据。

以上对中国农民的认识，是研究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依据。

一、人口结构

纵观世界人口，虽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未曾停止的局部战争以及严重疫病的流行，使人口有所下降，而总的形势是由于出生率的大幅增加，死亡率大幅下降，使自然增长率提升，人口总量大幅增加。据世界银行统计，1919年全球总人口仅为18亿，2021年达到74亿，其中1930年为20亿，1960年为30亿，1974年为40亿，1987年为50亿，1999年为60亿，2013年为70亿，2021年为74亿。从中可看出每增加10亿的时间有所缩短，有专家预测，全球人口可能超过90亿达到100亿。“人口爆炸”是世界性难题。

中国在1919年正处于清王朝末年末与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人口有所下降。民国8年，人口为45265万人，1920年为44715万人，1925年为4.83亿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为4.5亿人。新中国建立以后，除1960-1961年因天灾与政策失误出现非正常死亡导致负增长外，人口是迅猛增加的。至2021年达到14亿，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一是放开生育政策，人口迅速膨胀发展；二是实行节育政策（二胎），人口处于稳定增长；三是鼓励适当提高生育率（三胎）。70多年以来，人口净增长年均2000万人以上的有7年（1965-1973年），最高为2321万人（1970年），平均净增长1000万-2000万人

的有 35 年，其余均为 1000 万人以下，特别明显的是自 2014 年净增加 920 万以来有所下降，2015 年为 681 万，2016 年为 906 万，2017 年为 779 万，2018 年为 530 万，2019 年为 487 万，2020 年为 204 万，2021 年为 48 万，已接近零增长，中国人口正在步入倒“U”字形发展轨迹，预计 2022 年将提前达到最高峰值，不会出现人口学家预计 15 亿的峰值。以 2018 年为例，大陆人口总数 139538 万人，比上年增加 530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1523 万人，出生率为 10.94%，死亡人口 993 万人，死亡率为 7.13%，人口自然增加率为 3.81%。从性别结构看，男性 71351 万人，女性 68187 万人，男性高于女性，以女性为 100 计算，总人口性别比为 104.64。从年龄结构看，0-14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 16.9%，15-60 岁劳动年龄人口 89729 万人，占总人口的 64.3%，60 岁以上老人 24949 万人，占总人口 17.9%，其中 65 岁以上的老人 16658 万人，占总人口的 11.9%。从区域分布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为 83137 万人，比上年增加 1790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为 56401 万人，比上年减少 1260 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59.8%，比上年提高 1.06 个百分点，全国人户分离人口 2.86 亿人，比上年减少 450 万人，其中流动人口 2.41 亿人，比上年减少 378 万人，如按户籍人口计算，包括 3.8 亿户口在农村的农民工在内，城乡人口之比为 4:6，农村人口仍占大头，这是中国人口结构最大的失衡，其深层的原因是新中国建立后实行工业化，由于“一穷二白”，又无经验，只能向苏联学习，以他们为榜样，实行以重工业为主的方针，由于重工业的有机机械构成很高，难以吸收农业劳动力，也就是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中农业剩余劳动力未能同步进城，加上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使农民长期滞留在农村，成为“世袭人群”。

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学上的“推拉定律”（农村推力，城市拉力）的驱使下，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排除极大的困难，以“自带口粮”的办法，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经商，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城市里就业的群体，而由于户口仍在农村，出现了“两栖人群”，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移民”运动，最高达 3 亿，相当于美国人口总数，由农业转为非农业的就业，而转移成本都是农民自己承担的，政府一分钱也没有花，古今中外极为罕见。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一是家庭人口就业多元化。包括离土不离乡就地在乡镇企业务工经商的与离土又离乡进城务工经商的两类。家庭出现了 4 种类型：一是纯农户，二是以农为主的第一兼营户，三是以非农为主的第二兼营户，四是纯非农户。这种状况还在继续发展之中，已不是传统的单一务农的农户。

二是农民身份的多元化。随着农民职业的多元化，农民既有仍在家务农的劳动者，又有在当地或外地务工经商的劳动者。在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农民既是社员又是股东，既是劳动者又有产者二重身份。

三是工业化、城市化模式的多元化。新中国建立后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一是以集中在大中城市为主，二是以发展重工业为主，三是以国家投资为主，四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这个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暴露出单一化的缺陷。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自主发展乡镇企业，形成了与上述工业化、城市化不同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即以小城镇为主，以轻工业为主，以民间投资为主，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创造出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异军突起的半壁河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空间更为广阔。浙江省温州市龙港镇成为中国第一个镇级市，北京市昌平区郑各庄村的温都水城，被美国哈佛大学认定为自主工业化、城市化的典型。全国年经营收入超过 200 亿元的村有 10 个，其中有两个村超过 1000 亿元，他们是陕西省宝鸡市的东陵村，山东省烟台市的南山村，行政村变成了小城镇，不仅使全村农民富裕起来，而且吸纳外村农业劳动力就业也富起来。河南省南街村曾申报建立村级市，尚未得到批准，相信会出现一批村级市。即市的形式在原有的直辖市、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之外，还会出现一批镇级市与村级市。农村的人口结构必然产生巨大的深刻变化。

农村人口结构的突出问题仍然是人口大于城市，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低于城市。在农村内部区域之间区别也很大。沿海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大于西部地区，汉族地区大于少数民族地区，平原地区大于山区，缩小这种差别不仅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第二个奋斗目标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以人为本是我们强国之基，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体，人力资本是生产之要素中的首位，在中国“人口”红利永不会消失！

二、劳动力结构

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了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从事这一伟大事业劳动的人是劳动者，即劳动力（Labor Power）。劳动力的适龄阶段是指 14 岁至 60 岁的人，即在人的一生中去掉童年与老年两端的中间阶段，也是创造人类文明的最重要阶段。劳动力包括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两大类，前者主要是指从事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者，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两大类，也就是生产工业产品的工人与生产农产品的农民；后者主要是指从事文化部门的劳动，创造有精神价值的劳动者。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两类劳动者往往融为一体，跻身于一人，也就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劳动者的就业率与失业率往往成为国家与社会兴衰的重要标志。在这个关系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权益的巨大群体中，农村的农民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关切农民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迄今还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一是数量问题。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增长年代，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也就是廉价劳动力，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在国际化大潮中，这种优势已经消失，甚至出现劳动力短缺、用工荒问题。其实从总体看，农村劳动力供给潜力远远大于需求，仍然处于供给大于需求的劳动力过剩时期。全国城乡劳动力总数约为 7 亿，其中农村劳动力为 4.5 亿，务工经商的 3 亿，都是青壮年，务农的还有 1.5 亿，多为老年，在有限的 18 亿亩耕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每个劳动力平均 10 亩多一点。按照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提出的工业化理论，随着工业化农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逐渐下降，即农业人口与农业劳动力也会随之同步下降。在我国实际相反，工业化水平已经很高，农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已下降到 10% 左右，但农业人口与劳动力数量仍居高位。河北省邢台市沙河乡由现代化面粉厂带动实现规模化经营，在 3 万亩土地上只用 60 名现代新型农民经营，每名承担 500 亩土地，不仅全程实现了现代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与纯收入，即使在现行粮价低的情况下，仍能致富，使绝大多数农民转为工商业就业，既有工资性收入，又有转让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地租），面粉厂也有优质小麦原料的保障。如按此计算全国只需 3200 劳动力就够了。这就是体制潜力焕发出来解决劳动力供给失衡问题的有效途径。

二是质量问题。这是农村劳动力结构突出问题，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打工务工经商赚钱，导致从事农业劳动的老龄化，弱质化，这是人所共知又尤为忧虑的大问题，提出由谁种地的疑问？这是农村劳动力结构第二个失衡问题，比数量问题更为紧迫，影响土地的流转难以形成适度的规模经营，很大程度上农民不愿放弃土地的承包权，这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政府难以下决心解决的难点。国际上的两次危机，一次是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二是 2020 年的病毒危机，都有 2000 万农民工返乡，家里的几亩土地起了决定性作用，成为唯一可靠的社会保障，如果能够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是会自愿把土地转让出去的。建立培养现代新型职业农民的学校达到中专水平势在必行，每年大学毕业生 700 多万就业，居世界之首，其中包括农林院校的毕业生不愿去农村就业，原因很简单，城乡差别太大，即使与所学专业不对口也要留在城市就业。教育部新部长怀进鹏提出对农村的幼儿园加大投入，配备优质教师，提高他们的待遇，这是治本之举。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农民质量，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产权结构

产权结构，也就是资产的所有权问题，多年来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在城市是国有制，在农村是集体所有制，这也是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农民首先突破“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创造了土地的“包干到户”，带动了整个农村乃至城市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土地的“包干到户”只解决了经营权问题，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使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为解决温饱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未涉及所有权问题，是“半拉子”的改革，加上产业结构单一化，经营规模小型化，难以致富，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之中。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扩展为乡镇企业，除原有乡、村两级集体所有之外，增加了个体，私营企业呈现出所有制“四轮驱动”的多

元化，引发了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建筑、服务五业并举。既吸纳了多余农业劳动力的就业，又能增加农民收入，在农村产权变革中，农民创造了股份合作制，使以苏南为代表的集体所有的企业与以温州为代表的个体私营所有的企业“殊途同归”，既解决了集体所有农民主体地位“虚化”问题，又使个体、私营企业产生了“公共积累”，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使农民成为有产者，能直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但这项改革遇到极大阻力，认为这是“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做法，阻碍了立法的进程。值得重视的是，把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转移到土地的产权改革上，第一个建立在土地上的股份合作制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县罗镇下坡村，但这项改革的阻力也很大，难以推广。目前实行股份制只局限在承包权，而不涉及所有权，认为把股份所有权落实到农民身上就是“私有化”，是对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瓦解。农村的宅基地，一直与房屋一起属农民所有，在1962年修改人民公社60条时决定变为集体所有，产生了与房屋所有权分离的问题。近20年来，鉴于农民主体地位“虚化”的集体所有制出现的弊端，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探索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接着先在贵州后在各地出现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股权，农民变股东”的做法，深受农民欢迎。为此，由我与几位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组成课题组，在农业部经管司的支持下就股份合作制立法问题提出研究报告并附了法律草案，受到全国人大常委农委与农业部领导人的赞赏，由于认识不统一而搁浅。在《土地管理法》制定与先后两次修改中提出把股份合作社加速进去，也未能如愿。由此可见难度之大，而过不去的坎除了意识形态的障碍外，还有有关部门与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形成的“以地生财”的利益结构不肯改变。在城市化急速发展中，需要土地的支持，20年来土地“农转非”1亿多亩，每年都有地方政府直接操办，用低价征收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垄断一级市场）变为国有，然后转至城市，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经营二级市场），从中获得差价收益，变为财政收入，这被称为“卖地财政”，土地出让金自1999年至2021年累计近50多万亿之多，相当于近年全国GDP总量的一半，而农民所得无几，这不仅违反了资源配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而且直接损害了农民的权益，为产生腐败铺了路。这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2021年中农办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土地出让收入应实行“取之于农用于农”的要求，召开会议研究提出土地出让收入（扣除成本）用于农的比例不低于50%（近年来实际只有6.6%），虽有所前进，而步子太小，应让地方政府放开一级市场，退出二级市场，不要让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体制继续下去，需要下决心动真格采取大手术解决。

目前，民营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有益的补充，而且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农村开创先河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进入，开创了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新格局。维护与壮大农村集体所有的产权，不等于要损害作为集体所有主人的农民权益。这应成为在产权改革中必须遵守的一条底线。

四、产业结构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这是中国一个永恒的话题。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得到持续稳定发展，对确保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在GDP总量中，工业产值以及相应的第三产业占的比重大幅上升（第三产业已超过第二产业），而农业产值占的比重大幅下降，2021年已下降到10%以下。新中国建立后农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80%左右的地位，而工业与服务业的比重只占20%左右。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二、三产业的比重虽有所上升，而农业的比重下降不大。改革开放以来，加速了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使二、三产业的比重急剧上升，农业的比重急剧下降，这是中国社会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在农村内部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表现在农业与非农业，也就是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的比重，由以农业为主变为以非农业为主，农村工业占农村GDP的比重上升到45%左右，农村服务业占30%左右，而农业占25%左右。

二是在农业内部从以种植业为主转为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种植业，林业产值的比重显著上升，森林复查率大幅提高，渔业以捕捞为主转为以养殖为主，占的比重也大幅提升。

三是在种植业内部，以粮食为主，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济作物，形成粮、棉、油、糖、果、菜、茶、花等共同发展的格局。

可以说，农村产业结构最大的变化就是一、二、三产业全覆盖，这是对忽视农村去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产生重大缺陷的弥补，也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甚大，三个产业的比例全有极大差别。由于尚未见到东、中、西三类地区的统计数字，从一些典型事例，对农村内部做一些三次产业大概轮廓的推算（%）。

地区 产业	东部	中部	西部
一产	5	20	35
二产	60	50	40
三产	35	30	25

这种差异随着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会有所缩小。特别西部地区多为山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具有较强的后发优势，从这种优势出发，选择发展第三产业（旅游观光）入手，带动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个经验值得重视。

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农业仍是基础，不能由于二、三产业发展起来而忽视第一产业，或放松农业，其中特别值得深思的是，自2004年以来，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中，由净出口变为净进口，由顺差变为逆差，而且每年大幅增加。据统计净进口各种农产品所需耕地为8亿亩，相当于国内耕地总量的44%，其中粮食净进口量高达1亿吨以上，相当于国内产量的1/6，严重影响和冲击“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手里”的基本原则，这是潜在的危险，需要认真严肃看待。有人认为由于国内土地与水资源不足，而进口产品价格便宜，因而认为进口有利，这完全是一种侥幸心理，应予纠正。特别是遇到全球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战争，依靠进口会吃大亏的。

优化农业农村经济的结构，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化，还要调整农业科技结构与路线，由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石化技术向以可持续发展的生物技术转变。中国的生物技术资源与成果十分丰富，如近年来林占熺创造的菌草技术，任荣荣创造的饲料桑技术，那中元创造的生物诱导剂技术，孙鸿良创造的籽粒苋技术等，把传统的农业技术与现代的农业技术结合起来，既能增加产量，又能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提高抗逆性，增强市场竞争力，还能开发利用沙荒地、盐碱地等资源，优化生态环境，值得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导技术路线。

农村一、二、三产业协调、均衡、高质量发展，主要靠提高科技贡献率与科技成果转化。这就需要推进科技体制的改革，发挥科技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先作用，真正体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五、收入结构

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能够先后消灭了800多个贫困县的8亿农民的绝对贫困（重点在农村），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中最为伟大的创举。全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2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GDP）超过110亿元，位居美国之后的第二位，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而农村经济在全国GDP总量中居“半壁河山”的地位，是农民不畏艰辛闯出来的，是来之不易的。但应看到，人均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1/6，差距还是很大的。在消灭绝对贫困（标准为收入日消费1美元，折合人民币年均收入为2300元），标准是很低的，按照国际标准日均消费不低于1.9美元计算，折合人民币为年均收入4600元，也就是浙江省于1995年全省达到的水平，进入低收入人群之列，这是平均数，高低收入之间差距很大，特别是从城市居民与农民收入之差来看，在近年来有一定缩小，从最高3.33:1下降到2.5:1，也就是改革开放前1978年的水平，1984年曾下降为1.7:1，是历史最低的一年，此后不断扩大，这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接近几年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幅度既高于GDP增长幅度，又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从而使差别每年缩小0.1计算，达到1:1，需要15年时间。按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警戒线为0.4，而我国多年来一直处在0.4以上，最高达到0.47，而重点在农村。中央提出“共同富裕”非常必要，就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减

少低收入人群，对高收入人群采取有效政策措施，调整合法不合理的收入，严惩非法腐败收入。据有的经济学家测算，目前中等收入人群约为6亿，只占人口总数的40%左右，距建立“橄榄型”收入结构的目标还相当远。在农村内部也需要缩小东、中、西部农民收入以及产业之间收入的差异。

当前最为突出的是靠种地，特别种粮食富不起来，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务工经商，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大大超过土地的经营性收入，种地经营性收入大大低于工资性收入，这是农民家庭收入结构的二元化，也是一种新的“剪刀差”。种地特别是种粮食收入低的原因主要是经营规模太小，属“超小型”农户经济，劳动生产率太低，同时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仍然大幅上升，纯收益下降，这是显性成本，即物化劳动成本，还未计算隐性成本，即活劳动成本，这是研究与制定农村有关政策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在合作社与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是依靠“工分”计算收入的，在实行“土地包干到户”以后，取消了“工分制”，活劳动收入是不计入生产成本的，这是一个不完全成本，如计算进入成本，种地特别种粮食是负效益。这个“剪刀差”导致家庭收入的“剪刀差”。对此，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国家提高粮食价格上，而现在的收购价格已高于美国的市场价格，加上对小麦、稻谷的最低收购的保护价，更高于国际的市场价。有人说，一斤粮不如一瓶矿泉水，这是事实，但不能解决种地特别是种粮效益低的根本问题。

衡量农村收入结构常用恩格尔系数（指食物消费占消费总量的比重），以温饱为标志，大体以50%的系数为界，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引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据统计2020年全国的恩格尔系数为30.2%，其中城市为29.2%，农村为32.7%，说明已跨越了温饱型进入了小康型社会。

此外，农民家庭收入结构还有一个变化是有了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指转让承包土地的收入（即“地租”收入），尽管目前所占的比重还低，但在实行土地股份合作的地区，这项收入已占10%以上，有的达到30%以上，这是农民从无产者向有产者转变的重要表现，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工商业金融企业中，农民当了股东，分享集体所有经济增值的分红收入，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中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解决收入差别过大问题，乃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六、消费结构

生产决定消费，农村与城市一样，在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食物消费的主食由植物性粮食为主转为动物性肉、奶、蛋为主，标志着营养质量的提升，而后者又是由粮食转化的。因此讲粮食安全不能只讲口粮的自给，也应包括动物性食品所需的饲料粮。二是以物质消费为主，逐渐向文化消费为主转变。即在解决温饱问题后，由物质需求转向精神需求。三是由季节性消费向常年性消费转变。四是本地消费向异地消费转变。五是农村消费向城市消费转变，同时也有城市消费向农村消费转变，也就是“双向消费”。六是由国内消费向国际消费转变。这是一个大致的趋势。总之消费的多元化，自然带动了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农民家庭中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二元化。虽然还保存自给半自给自然经济的某些特征，而更多的是体现了商品化与市场化的特征。目前不少种粮食的农民生产的粮食都出售，而自己吃的粮食在市场购买。

消费市场有国际消费市场与国内消费市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消费大国，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已居世界前列，既有生产资料也有生活资料，农产品与日用小商品出口额占的比重很大，都来自农村。中国国内的消费市场有两个，一是城市消费市场，二是农村消费市场。多年来，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城市消费市场日益增长，而农村消费市场慢于城市，形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二元消费结构。其实消费潜力主要在农村，人口大国实际上是农村人口大国，人口的60%以上在农村，分布在3万多个乡镇、40多万个行政村与400多万个自然村，包括从寒温带到赤道热带，发展空间远远大于城市。目前的消费水平虽然低于城市，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也会提升，所谓衣食住行四大消费重点在农村，包括住有所居、幼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的需求，重点都在农村，只要把投资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就会形成巨大的生产力，提升农村的消费能力，形成宏大的消费市场，为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取得明显的成效。这就需要调整“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思维方式，真正把战略重点转移到新农村建设上来，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村潜力更大。目

前在抗击疫病中强调以拉动内需为主，而内需的重点应在农村，发展房地产业是拉动内需的重要抓手，而只面对城市，又要农村提供土地，这是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低价买农民土地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获取巨额的差价收益，这条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是不能再走下去了。

农村消费要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实行良性消费，而以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为前提的消费，把废弃物充分利用起来，形成需求产生消费——消费促进生产——生产保障消费的良好循环，把消费与勤俭节约统一起来，树立“浪费可耻”新风尚，避免奢侈消费，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不良消费行为。据有人统计，目前粮食在餐桌上浪费触目惊心，每年消费 1700 万吨至 1800 万吨，出现在中国是极不应该的。

在农村还存在大操办“婚丧嫁娶”的习俗，应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农民移风易俗，节约从事，把消费建立在有“公德感”的基础上，形成全民的自觉行为。

七、阶层结构

过去农村的阶层结构比较简单，主要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还有少数“儒生”，也就是知识分子，加上政府基层的“官吏”，这种阶层结构持续了两千多年之久。在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阶层的分化，由于工商业的兴起，产生了资本家与工人两个阶层，还有受过现代教育（洋学堂）的知识分子。新中国建立以后，实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富农阶层，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资本家的工商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成为国有企业，员工成为产业工人阶层，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中，城市的工商企业均为国有，产生了企业的领导人与企业职工两大阶层以及部分科技人员阶层，还有文化领域里的一批知识分子阶层。农村在组织起来以后建立了集体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包括以土地入股分红的初级合作社，与土地、牲畜、农具无偿转为集体所有的高级合作社以及“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社员是农民，管理人员是不脱离生产的农民。还有从事为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服务的企业供销人员、交通运输企业人员、建筑企业人员、农产品加工企业人员，均属于农村内部企业的人员。还有文化教育、医疗等事业单位，也逐年建立起来，其员工隶属于国家有关部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社会阶层，随着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变为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而产生了多种阶层。农村总人口为 9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60%，大体包括：

1、农民阶层：(1)农民既是从事农林牧渔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者；(2)农民又是集体所有经济组织的成员，全国有 1.5 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17%。

2、工人阶层：包括(1)离土不离乡就地在乡镇集体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务工经商的农民工 1 亿人；(2)也包括离土又离乡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 2 亿人，二者合计 3 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33%。

3、知识阶层：系事业单位的人员，包括(1)学校的教职员；(2)医疗部门的医务人员；(3)技术推广部门的科技人员。

4、基层组织阶层：包括(1)党团组织的领导人；(2)村民自治组织的领导人；(3)政府有关部门派驻农村的领导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曾对新时期中国社会阶层作出详细调查分析，并有专著。

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农村也存在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属非公有制企业，企业的生产资料为企业领导人（董事长、总经理）所有，这是中国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包括在中央的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股份制，允许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参股，并享有股东权益，符合中央提出两个不动摇方针（坚持公有制为主不动摇，支持非公有制发展不动摇）。也有人提出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处于五（50%税收）、六（60%GDP）、七（70%科技创新）、八（80%劳动力）、九（90%企业个数），是否对公有制为主产生影响？是否应有一个边界线？这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不应轻易做出判断。现在还在研究推行各类企业（包括非公有制企业）建立第三次分配的制度，承担社会责任，是很必要的。

八、社保结构

以医疗与养老为中心的社会保障，是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的重要特征。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保障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还建立起覆盖整个城市与乡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 60 岁以上的老人颁发了“社会保障卡”与“老年卡”。大中城市的规模与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党中央高

度重视这项重大工程，按照不同类型的人群采取分类实施的方针，例如在新中国建立前参加革命的人员作为“离休”有别于“退休”，对他们在退休后，仍保留原有工资待遇与全公费医疗待遇，还按参加革命的时间，分别增发工资，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增发一个月工资，在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后期增发两个月工资，前期增发两个半月工资，在大革命期间参加革命的红军增发三个月工资。各地对 80 岁以上的老人分别给补贴，例如北京市政府规定 80 岁至 89 岁的老人每月补助 100 元，90 至 99 岁的老人每月补助 500 元，100 岁以上的每月补助 800 元，显示出中国处于盛世时代的荣幸。

在农村的社保，起步比城市晚一些，但发展也很快。早在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农村鳏寡孤独废疾者建立“敬老院”照顾老人，也有“赤脚医生”给病人看病，虽水平较低，也说明传承与弘扬了早在两千年以前孔子提出建设“老有所终”的“大同世界”传统。在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全国农村建立起“合作医疗”与“养老金”体系，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重大举措。以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为例，首先以户为单元建立合作医疗制度，每人每年缴纳一定费用（从 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即可享受看病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待遇。因病需住医院的费用可报销 40%，既可住本地医院，又可异地住院，实现了“一卡通”。在当地门诊看病的就地在乡镇卫生院报销。其次对 60 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金，在未到 60 岁之前，每年预交 100 元—200 元，养老金每月由 60 元增加至 105 元，80 岁以上的老人增加 150 元，90 岁以上的增加 200 元。在乡镇所在地与大的行政村建立起“养老院”，接受身边无子女的鳏寡孤独与废疾老人安度晚年。把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中西医的医院，乡镇有卫生院，村有卫生室的医疗体系，基本上可以就地看病。

农村的社保结构存在三个明显的失衡问题，一是无论从规模或水平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特别是设施与医务人员质量，由于对县及县以下的乡镇与村庄的医疗设施投入太低，造成这种失衡。二是在农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由于自身的经济实力较强，出现了医疗设施与医务人员水平高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失衡。三是医疗设施与医务人员主要是西医，出现了忽视中医的失衡。这三个失衡导致农村病人流入大城市，增加了大城市三甲医院的压力，为此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把政府投入从以大中城市为主转为以县乡村医疗系统为主。强化中医教育，大力培养从事中医的医务人员。目前，许多国家把中医作为发展医疗事业的重点，设立中医院校与中医医院以及门诊所。在治疗新冠病毒中，显示出中医的优势。因此应扭转轻视中医的思维观念，在农村逐步使中医在整个医疗体系中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九、教育结构

教育是建国之基。全国在普及 9 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正在普及高中，大学有了巨大的发展。农村教育有了历史性进步。

新中国建立前，虽在鸦片战争以后，引进了西方的新式教育，创办了“洋学堂”（包括大学、中学），培养出一大批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的人才，但不少地方仍有“私塾”，继续培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才，尤其在农村。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局面有了很大改变。目前，农村的九年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也已基本普及，高中的入学率有所上升，但基础薄弱，教育质量低，教师水平不高，设施简陋，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学校分散，这种现象更为突出。据有的专家在农村的实际调查发现，农村学龄儿童的智商低于城市的 15%，这是很值得重视的。有的农村在小学六年级时可以住校，一周之内有五天在学校吃饭，要交伙食费，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要控制伙食费的支出（每天不超过 20 元），自然会造成营养不良的现象。因此应把教育投入重点放在农村的中西部地区，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与支持师范院校优秀毕业生到农村任教，提高他们的待遇。

农村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元化，即多学科的人才。因此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包括中专与大专），特别要兴办专门培养新型职员农民的学校，即从农村高中毕业的学生中，招收家在农村的学生，就地进入这种学校，学习现代农业的各种知识与技术，可分为农、林、牧、渔多个专业，毕业后就地从事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农业生产、加工、运销等工作，他们的收入水平大大高于进城务工经商劳动力收入水平，也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素质，解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后继无人“由谁来种地”的重大问题。每个乡镇办一所这样的学校，全国就有 3 万多所，每所学校招聘 10 名以上高

等农业院校各专业毕业生到这种学校任教，就能为他们提供 30 多万与所学专业对口而学用一致的就业岗位，并提高他们的待遇。这是实施乡村战略的重大举措，列入国家教育发展规划，拨出所需投资。最近有传言，中国农业大学招不满本科生与研究生，高中毕业生由于农村艰苦，不愿到这里学农，反映出在青年一代就存在轻视农业农村的思想，充分说明这种思想多么根深蒂固，决不能等闲视之。

提高全民的思想文化素质，需要从娃娃做起，也就是从办好幼儿教育做起，尤其在农村更为迫切，教育部为此做了专门部署，望能落实，会有成效。

十、基层组织结构

按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有中央—省—地—县—乡五个层次，乡镇是农村的基层单位，但乡镇以下的村，包括行政村（相当人民公社时的生产大队）与自然村（相当人民公社时的生产队）不算基层政权单位，实行村民自治。实际上有 40 多万个行政村与 400 多万个自然村是真正的基层单位。这里讲基层组织重点指行政村与自然村，其组织结构大体有三类。第一是党的组织，包括村党委、党总支、党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三个作用：(1)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党员的先锋作用；(3)干部的骨干带头作用，也就是在当地各项事业中发挥领导作用。在基层还有共青团组织，属于政治组织。第二是村民自治组织，属于社会组织。这是在改革开放中由农民创造出来的，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实行政社分治，公社变为乡镇政府，按原计划在行政村设立“村公所”，作为乡镇政府领导下的派出机构。但是广西柳州市宜山县三岔乡冷水村，不设“村公所”，改为村民自治，实行四大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行政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在自然村建立村民小组，很快得到中央的认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依法在全国推行。这一创举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认为开创了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政治的先河。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实地考察了江苏省吴县一个村庄民主选举的全过程后说，“中国农民找到了行使当家做主权力的诀窍”。第三是集体经济组织，包括合作社与公司等属经济组织。在农村的以上三种组织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三足鼎立”的基层组织结构。到目前为止，农业农村部政策改革司最新统计，全国乡镇总数 36472 个，行政村总数 559669 个，村民小组 4500327 个，集体经济组织 531553 个，拥有 27285.6 万农户，101521.5 万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是主体，农村基础组在第一线承担的任务十分艰巨。

第一，中央有关农村的大政方针政策，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省—地—县—乡的多层运作，最终落实到农民身上的任务，基层组织是直接的承担者，“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又面对最大的千家万户的农民群体，守护他们的权益，自然难度甚大，有时还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为他们创造一个能从本村的实际出发，走适应当地农民需要发展道路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农村基层组织的现状是历史形成的，党组织是基层组织的核心，党支部建立在农村的最基层，这是毛泽东主席早在井冈山为加强军队建设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所谓的“三湾改编”）的发展，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党支部在工厂建在车间，在学校建在班级，在机关建在科室等，使党的领导有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关键是要有一个能够创新开拓，勇于担当责任，把“人民至上”结合农村实际变为“农民至上”的清廉奋斗的书记（也称“一把手”）。号称“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是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楷模，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展，由支部书记变为党委书记。“这也难那也难，一把手重视就不难”。也有少数支部书记蜕化变质为鱼肉农民的“村霸”。

第三，村民自治组织，是农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力的组织，在现行体制下，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成为乡镇政府领导下承担政府职能的村级组织，有人把它称为“准政府组织”。由于乡镇政府有“七所八站”，机构庞大，必然会增加对村组织的负担，又难以应对，这就需要根据村级组织的任务，改革乡镇及其以上的政府管理体制，包括精简层次与部门，转变政府职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改革，但成效不大，这反映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需要有大的改革举措。

第四，村民自治组织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发挥“四大民主”的作用，与经济组织的职能是不同的。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管理是经济组织的职能而不是村民委员会的职能，目前土地的承包权管理绝大多数村是由村委会承担的，这是由于当时有许多村在人民公社解体后成为“空虚村”，在制定《农业法》时

规定，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这一规定为村委会行使土地经营管理权提供了法律依据，由于村委会设在行政村（相当于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无形中把原来三级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把土地、劳动力、农机具、大牲畜固定在生产队（所谓“四固定”）变成以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被人们称之为“穷过渡”，一直坚持至今。

第五，农村基层组织的强弱也反映了农村经济实力的强弱，有很大的差别，东部强于西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应把重点放在西部地区的农村，国家财政支出有了很大的增加，用于农村支出的比重应与农村经济对与 GDP 总量贡献的比重 40%左右相适应。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已进入“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2010 年首次提出财政用于农村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达到 10%以上，尚未实现，这是农村成为短板的明显表现。

第六，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自然会引起上层建筑相应改革，包括从中央到基层机构的改革。一是行政管理减少层次，实行中央管省，省管县的三级制，地市级改为省的派出机构，乡镇级改为县级的派出机构，实行乡民自治，在“皇权不下县”的原则下，扩大县级权力，财政收入全部留存不上交，有些县财政收支有缺口的由省内平衡。二是实行大部门制，合并有交叉与重叠的部门，压缩部门的数量，减少公务员的编制。三是事业单位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减少公办规模降低占总量的比重，扩大民营规模，提升占总量的比重。四是根据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退出在市场从事经营的活动，各种社团组织，在共产党统一领导下，自主活动。这样就可以人大幅减少吃“皇粮”的人员，大幅降低征收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形成廉洁、精干、高效、勇于担当的行政管理体系。

结束语：

农村社会结构是国家整体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城乡统筹兼顾，关键是要消灭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破除诸多艰难险阻，使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经验。在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必然会出现不完善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及来自多方面的风险与挑战。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在胜利完成第一个一百年的任务基础上，正在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光明大道，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光辉目标奋勇前行。衷心祝愿今年即将召开党的第 20 次代表大会胜利成功！

【注】：

此篇拙文，由于是在病中写出的，时间为 2 月 15 日至 20 日，系资料性，虽有若干分析与建议，纯系个人一孔之见，会有不妥之处。对所用的统计数字，都是有关部门公开公布的，未能仔细核对，会有不准确之处。留个史料，立此存照，录以备考，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感谢多年来支持与帮助我从事农村政策研究的领导、学者与朋友。感谢石璐为此文进入电子版付出的辛苦。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高级经济师。2022 年 5 月 26 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及各研究所
发：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副 主 编：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石 卉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